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蒙古的宗教

中國西藏和蒙古的宗教

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

主編

二 蒙古的宗教

(西德)海西希 著



LES RELIGIONS DE LA
MONGOLIE
WALTHER HEISSIG



蒙古宗教

序 言

1846年，青年布里雅特蒙古學者多爾吉·班札羅夫于喀山出版了一部俄文著作：《蒙古人中的黑教或薩滿教》，作者企圖提醒大家注意在蒙古存在有一些其淵源甚至比該地區的佛教還要古老的宗教形式。蒙古北部的佛教形式在原則上與西藏佛教是一致的，因為蒙古佛教源出于藏傳佛教，圖齊教授在本書的前一部分不僅對這後一種佛教形式作了完整的描述，而且還作了考釋。因此，我們除了簡單地論述一下佛教在蒙古的傳播之外，還有一項敘述蒙古人在佛教之外的民間宗教觀念的任務。自從多·班札羅夫大作問世以來，一百二十多年的光陰已經流逝了，我們又得悉了豐富的資料和學術論著。經過諸如B.仁欽、B.索德諾姆和C.索德諾姆、D.切仁索德諾姆、噶丹巴和瑪尼扎布這樣的蒙古學者的努力，使我們在近十幾年來可以得到一些截止那時為止尚不為人們所知的基本文獻和資料。我個人在歐洲圖書館中覓得了多達七十八部載有關於民間宗教中的祈禱經文和乞求神靈保佑資料的手稿，我們為此而應感激西方學者和旅行家中的資料搜集者們的細心和熱忱。恰恰也正是這些人為我們提供了對蒙古地區佛教之外宗教表現的主要陳述。這七十八種文獻也已經用轉寫文刊布。本論著首先是以蒙文文獻為基礎的，對於其它語言的著作僅僅予以次要的考慮。所以，它僅僅是對目前所知道的和可以得到的資料的梗概性介紹，而且也是根據這些資料而構思寫成的。多·班札羅夫于1846年表示的要撰寫一

部有關“黑教”的“系統和完整的著作”的希望在短時間內是難以如願以償的，但我們認為已嚮着對各種現象的系統總結又前進了一大步，本文中所闡述的事實在蒙古地區業已不復存在，我們最多也祇能觀察到一些最後的殘餘。但是，這就使瞭解這一切更為重要了。

我首先要感激我的學生們，他們對蒙古古老宗教觀念的強烈興趣不斷地砥勵筆者繼續對這些資料的探索。我同樣也對所有那些使我得到資料和手稿的人表示感謝，尤其要感謝哥本哈根國立博物館民族部、萊頓民族學博物館和海德爾堡波爾泰姆基金會。我還特別要對科隆的富克斯教授表示感謝，承他美意纔使我得到了本文插圖中的一些圖樣。我此外還要向科隆的布呂姆夫人表示感謝，她非常靈巧地和仔細地繪製了本書插圖中的圖案。不言而喻，本書的出版者及其出版公司也值得我表示感謝。

如果本人的嘗試可以鼓勵學術界繼續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那麼我的勞動還是值得欣慰的。

從本人做學生的時代起，即在三十多年之前，蒙古學研究的老前輩波帕有關蒙古人崇拜火和有關“薩滿教”著作抄本的研究就已經引起了本人更為清楚地探討這一內容的強烈興趣。請允許我謹以本著這份微薄禮物而獻給他。

蒙文讀音規則

Č 相當于 ts

J 相當于 dz

q 相當于 ch (德文)



第一章 蒙古人中的喇嘛教和民間宗教

十九世紀時，在內蒙古地區共有一千二百多座寺院和喇嘛廟。蒙古的這一部分地區現在已劃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中。當時在現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外蒙古則共有七百多座^①。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一個兒子致力于宗教職業，所以僧侶界幾乎占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1900年之前，在蒙古人居住地區總共生活有二百四十三位化身喇嘛（活佛），僅在內蒙古地區就有一百五十七名。清帝國的政策使得他們之中那些最為權貴者都被吸引到京師北京了。這些數字足可以證明以下事實：在十九世紀時，以佛教的一支而出現的喇嘛教在蒙古地區尚占優勢。對蒙古人中喇嘛教的論述與對西藏喇嘛教的論述是很相似的，因為喇嘛教在蒙古地區從思想上始終附屬於西藏，後者一直忠于正統的喇嘛教。當然，蒙古喇嘛們也都撰寫了一些有關神學的重要經文，但所有這一切都產生于藏傳喇嘛教派的教理結構內部，並不代表一種特殊神學發展。

但是，在喇嘛教與蒙古人古代宗教觀念相接觸之後，很快又導致了一種新的發展：由於某些古老形式被寫進了主要是蒙古語的經文中，所以它們逐漸被吸收、改造和系統化了。圖齊先生根據西藏精辟地分析過的這種發展過程在蒙古也一直根據自己的特點持續不斷演變：“當佛教古

①《寶貝數珠》（海西希版本），載《大亞細亞文化語言研究》，新編第2輯，1961年哥本哈根版，第11卷。

優勢時，這些原有的神靈也不會消失，其中有一些作為貴族們的先祖而存在……其餘則變作佛教之神，經過一場圓滿的改宗之後，它們又負擔起了保護寺廟或保證誓願聖性的職責……”^①

在有關用當地神祇來擴大喇嘛教萬神殿的問題上，圖齊先生指出：“事實上，地神和龍始終是對新參加者開放的。一旦當喇嘛教與新居民有所接觸，熟悉了其宗教歷史並試與自己的觀念相結合時，便會經常增加新的成分：一些非佛教的信仰便以這種方式而獲得正統的特徵……”^②

喇嘛教與蒙古人信仰的古老形式之結合、從其中獲得的影響以及由於在喇嘛教對民間宗教施加影響的壓力之後而得到的發展，所有這一切便形成了蒙古人宗教史的特殊方面，以上就是本論著意欲實現的宗旨。

在蒙古人中，喇嘛教可能是最早與因興奮而狂舞的薩滿教調和了。其傳播人也是男女薩滿，他們起了巫師的作用，人們一般均稱之為“波格”（男薩滿）和“伊杜干”（女薩滿）。這種薩滿教不是某些人的個人事業，相反却是指其輪廓非常清晰的一種信仰體系，也是按照某種教團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甚至在十六世紀末，還發現過薩滿們舉行會議來討論重大問題的活動，如宣布某一位佛教弘法大師的到來等^③。此外，這些宗教觀念的相似性，來自南蒙古、察哈爾、鄂爾多斯、喀爾喀以及布里雅特蒙古人地區的薩

① 見《西藏畫卷》第2卷，第729頁。

② 《西藏畫卷》第2卷，第723頁。

③ 見《內濟托音傳》，達木丁蘇降版本，載《蒙古文抄本集》第14卷；海西希版本，載1953年《漢學》雜志第4期。

滿教祈禱經中提到的同樣的神祇，還有來自東蒙古地區薩滿們的贊歌，它們都傾嚮于支持談論那種以特定的形式組織起來的宗教思想方式存在的論調。這種因興奮而狂舞的薩滿教的贊歌和咒歌僅以口傳，即便是處在喇嘛教迫害的重壓下，它們還接受了喇嘛教萬神殿中的某些措辭和佛教圖象。贊歌本身中就有一些影射薩滿教是一種無經文經書的信仰這一事實的地方：

“我的祖師，啊！你賜給了我無經文的教理！”

我的祖師，啊！你向我傳授了無經書的教理！”

據傳說，在布里雅特蒙古薩滿江察波格（男薩滿巫師）^① 和東蒙古另一位薩滿教徒烏格得勒古的祈禱中，也以同樣的方式唱道：

“……你們三位是我的祖師，嘿！嘿！嘿！

以我無經文的教理，嘿！嘿！嘿！”^②

有關薩滿教理的一段布里雅特文論述見載于旺丹雲衝的史著中^③，該著成書于十九世紀。其中論述到：“凡加入薩滿教者絕不會有自己的任何宗教經文，所有的資料和布講都要口傳、銘記在心。所以，他們完全是根據傳說相傳的。”

① 記載于 1942 年，見《民俗研究》第 3 卷，1944 年版，第 64—65 頁。

② 記載于 1957 年，見瑪尼扎布；《關於使用文化遺產的商榷》，載《蒙古語文》，1957 年，第 10 期，第 50—55 頁。

③ N. 波帕版本，《布里雅特編年史》，載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論集》第 9 卷，1935 年列寧格勒版。A. 波茲德涅耶夫：《蒙古文選》，1900 年聖彼得堡版，第 263 頁；J. 帕爾塔儂英譯文，載《芬蘭—烏戈爾學會會刊》第 51 卷，1941 年，第 5—8 期。

來自同一傳播地區的薩滿教贊歌的一致性說明，當時存在有一個共同的教宗和師承體系^①。在這裏發現不了那種薩滿在某一尊“精靈”的脅迫下違心地講道和歌唱的現象^②，而曾有人介紹說在西伯利亞古代薩滿教某些分支中曾發生過這樣的事實，但在蒙古却没有出現過。

鑑于喇嘛教在十六和十七世紀間長期地堅持迫害薩滿教，後者被迫自我掩飾起來，并采納了喇嘛教的歷史和喇嘛教萬神殿中的神祇，而且還使用了喇嘛教祈禱中的詞句^③。在此期間，除了那些因興奮而狂舞的純潔的薩滿教贊歌之外，又發展了一種“混合的”，歸根結蒂也是完全“喇嘛教化了”的薩滿教贊歌形式^④。

然而，因興奮而狂舞的薩滿教除了這些形式之外，還有大量宗教生活的表現形式，這些形式均與薩滿沒有聯繫，因為薩滿履行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宗教生活却是各個社會集團、氏族和家庭的事。這些形式完全如同薩滿教本身一樣，也可以追溯到最為古老的時代，他們也祈求神靈的保護。崇拜長生天、崇拜火、召請格薩爾汗的保佑、崇敬王公家族的先祖成吉思汗、公開以神香祭祀騰格里天神以及

① W. 海西希：《論東蒙古薩滿教的同一性》，載《蒙古學論文集》，1966年威斯巴登版，第96頁；哈爾托德：《不里阿耳人地區的薩滿教徒》，載《蒙古學論文集》第76—78頁。

②迪奧斯澤吉：《西伯利亞諸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民俗》，1963年布達佩斯版，第267和374頁。

③ W. 海西希：《有關十七世紀喇嘛教鎮壓薩滿教的蒙古資料》，載《人類學雜志》，1953年，第1—9和493—536頁。

④見B. 索德諾姆：《蒙古異族巫師的咒語》，載《蒙古學報》第4卷，第3期，1962年烏蘭巴托版，第73頁，尤其是請參閱第91頁。



向群山峻嶺和它們固有的力量進行祈禱。這一切都是宗教活動的組成部分，完全如同祝福和詛咒一樣⁽¹⁾。與因興奮而狂舞的薩滿教的贊歌相反，這種“蒙古民間信仰”的祈禱經文在數世紀之前就已經記載成文。布里雅特青年學者多爾吉·班札羅夫早歿，他曾寫了一部研究蒙古薩滿教的先驅著作。他認為可以把喇嘛教企圖與之結合成一種綜合形式的做法看作是筆錄蒙古民間信仰表現形式的起源。他在 1846 年曾寫道：“……喇嘛們匯集了所有的民間祈禱經文，有時也以佛教的方式為它們補充部分新的片斷。但是，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我們至今尚掌握有以文字記載的古代神話的片斷⁽²⁾。”

然而，多爾吉·班札羅夫的觀點僅僅在章嘉呼圖克圖一世行使影響的時代纔有效，尤其是在賢禪師睿智洛桑丹貝堅貝堅贊時代更為如此。後者曾多次作出嘗試，企圖于 18 世紀創建一種蒙語民族文學⁽³⁾。應該指出，大量民間宗教的祈禱經文在喇嘛們開始行動之前就已經記載下來了，也就是說發生在十七世紀弘法大師們的第二次活動之前。對於一部有關蒙古宗教形式和思想的論著來說，絕對要把這些祈禱經文包括在需要研究的範圍之內，它們形成了已

① 見仁欽：《研究蒙古薩滿教的資料》第 1 輯；《史料文獻》。達木丁蘇降：《蒙古文學史》，1957 年沈陽版，第 247—259 頁；海西希：《蒙古民間宗教和民俗學文獻》，1966 年威斯巴登版，第 1—53 頁，同樣還可以參閱他在《參考書目》中所列舉的其它書。

② 《蒙古人中的黑教或薩滿教》，1846 年喀山版，《班札羅夫全集》，1955 年莫斯科版。

③ W. 海西希：《北京蒙古文木刻版本的喇嘛教經文》，1954 年威斯巴登版，第 128—139 頁。



存在的對蒙古人宗教生活和思想敘述的主要組成部分。

由於蒙古地區的地理形勢是一個文化走廊地帶，蒙古的宗教虔誠受到了各種外來影響的牽連，其中吸收了許多外來內容。早在各種史料向我們所介紹的蒙古人第一次皈依喇嘛教之前，它們就已經與佛教有所接觸。佛圖澄和其他漢族僧侶從公元四世紀初葉便開始皈依與中國北方的漢族—匈奴族毗鄰地區的居民。最早的佛陀形象可能是從這個時代傳來的⁽¹⁾。在七世紀時黠戛斯人汗國的發掘遺址中，已經出土了許多帶有漢文銘文的佛寺大鐘，即位于葉尼塞河附近的領土上。這就證明佛教影響在此之後還存在於這片土地⁽²⁾。在十三世紀于哈刺和林所建的皇宮地基上，還發掘到了許多佛教壁畫，它們來自從前于該地所建的一座佛寺中⁽³⁾。乃蠻和客列亦惕等突厥部族被成吉思汗降服之後，在某種程度上也參與了建立蒙古世界帝國的霸業，對蒙古民族集團的形成作出過貢獻，他們過去曾是景教信徒。十三世紀和十四世紀時，在中蒙古和南蒙古的蒙古人中也曾有過一些天主教徒。北京大主教約翰·孟德高維諾于十三世紀所建築的哥特式教堂的遺址已經在南蒙古發掘出土，該教堂是他為已皈依天主教的汪古部的闊里吉思王子所建的⁽⁴⁾。基督教信仰的殘餘在鄂爾多斯蒙古人中一直

(1) 莫沃壽：《佛圖澄傳》，載《哈佛亞洲研究學報》第11卷，1948年，第53頁。

(2) S. F. 吉謝列夫：《南西伯利亞古代史》，1951年莫斯科版，第615頁。

(3) 請參閱吉謝列夫的另一部著作：《古代蒙古城市》，1965年莫斯科版，第16—173頁。

(4) 江上波夫：《鄂倫蘇木和約翰·孟德高維諾羅馬天主教教堂的發現》，載《亞細亞學報》第211卷，1952年第155—156頁。



維持到本世紀中葉^①。由於同從事佛教修習的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突厥回鶻族具有密切的接觸，摩尼教、景教以及某些源出于這些宗教的思想都滲入到了蒙古人中，尤其是以光明而出現的摩尼教、霍爾穆斯達的形象、波斯的阿胡拉·馬茲達和三十三尊騰格里天神等。十三世紀蒙古人與前部亞洲有密切的經濟關係，前部亞洲的亞洲人在蒙古人向西方發動軍事進攻之後便開始在元帝國占據支配地位，所有這一切從此之後便引入了來自伊斯蘭教的影響。除此之外，後來還補充了其它影響，這些影響是由於佛教在十三和十四世紀牢固的立足而產生的。所有這一切很早就產生了結果，這就是諸說混合思想佔據了突出地位：各種神和各種宗教的相似特點引起了諸神的融合。據同時代的一個故事記載，元代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也把亞當稱作是佛教中的釋迦牟尼^②。

蒙古人的土著宗教觀念以及那種被稱為薩滿教的宗教都面臨着來自各大宗教的影響。由於缺乏考古史料，我們只能根據年代交替的順序來進行描述。有關薩滿教由察哈爾蒙古人中發祥的一種記述針對由於興奮而狂舞的薩滿教之外的蒙古宗教形式的多樣性而指出：“除了這些人之外，某些人崇拜風。其他人用柳枝扎成十字形，然後再獻祭給這些人。另外一批人把食物和飲料置于氈毯口袋中，崇拜此神。還有其他一些人（再一次）製作神像，在木頭上剪一匹馬和一個人，接着再使人像騎在馬上，再往他們自

①田清波：《鄂爾多斯資料集》，1934年北京版，第1—1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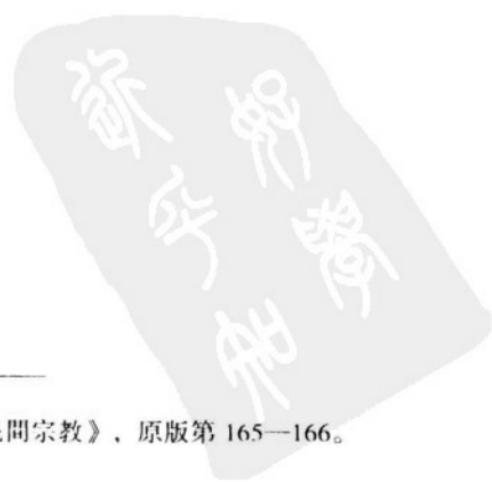
②K. 楊：《拉施特的〈佛陀的生平和說法〉》；《元代佛教史料》，載《中亞學報》第2卷，第88頁。



第一章

蒙古人中的喇嘛教和民間宗教

己雕刻的木人像手中塞一把刀，然後再祭獻給這一神像。還有些人製作銅馬和青銅馬，以祭獻給……”^① 有關這些獻祭儀式的祈禱經文至今尚不為人所知，我們僅僅知道對崇拜馬匹雕像的影射與崇拜格薩爾汗和對馬神的信仰相聯繫。因此，我們無法根據現象來描畫出有關蒙古民間宗教的一幅能够决定所有內容和完全有效的圖表。然而，我們可以根據現在所擁有的文獻和可以得到的資料的現狀而描述蒙古人中因興奮而狂舞的薩滿教，此外還可以描述民間宗教自十六世紀以來在與佛教的爭端中最重要形式的發展。但是，描述概況肯定應超過對細節的復原。



^①海西希：《民間宗教》，原版第 165—166。



第二章 蒙古人中的薩滿教

從有關蒙古人統一成一個國家時代的最為古老的歷史資料到近代的游記故事，我們都會從中發現一些可以證實一種宗教的存在，而這種宗教的主要特點則是因興奮而狂舞和有利于其信徒們的鬥爭能力，其信徒們在一些強制服務思想的推動下，可以對權勢和邪惡勢力進行鬥爭，遠瞻自己的前途，解釋這種前途和作出預言。

十二和十三世紀正是蒙古人從政治上加強和其帝國開國的時代，當時的文獻向我們介紹了一種宗教體系，其極高點就是青天或永生的青天。在公元一世紀的匈奴人中就已經出現了類似神的表現形式。作為神界、自然力的化身和形象的中間過渡者，這就是薩滿，薩滿們首先經常把自己說成是某一氏族或部族首領，這就是說部族或家庭的最高首領可以具有超人的預知力，可以在與先祖的靈魂以及地下和冥間的勢力保持聯繫。薩滿身穿白袍，胯下騎一匹白馬^①。薩滿屬於草原的貴族，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還可能是草原地區的領袖^②。春天要由女子或面對女子而舉行祭祀儀式。女子的這種作用可以使人聯想到西伯利亞薩滿教的特點，那裏的薩滿教徒常常具有异性性愛的特點。

唯有家庭成員纔可以提供一塊固定的祭祀地點以向祖

①見《元朝秘史》第 216 節，E. 海涅什德譯文第 105 頁。

②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1949 年巴黎版（法譯文），第 61 頁。



先進行祭祀，其辦法是在木杆上挂肉或馬匹。

時至今日，人們還傳說在北滿和阿穆爾河河套處的通古斯居民中仍存在有這樣一種以肉作祭祀的行為。在古老的阿爾泰部族中已經出現崇拜高地的信仰，這種信仰也由十二世紀的蒙古人所實施。對一些山脉和高地要用祭祀來表達崇拜，以表示謝意或驅散災難。有關這種祭祀的儀禮是九跪、光頭和把腰帶挂在脖子上⁽¹⁾。以各種形式保存下來的傳說都針對這一問題而指出，那些對“天父”的祈禱在很早之前就已經通用了。一種具有宗教特點的盛大節日曾是“紅盤日”，即仲夏第一個月 16 日的夏至⁽²⁾。當時還有一些神聖的數字：如三、六和九等。戰鼓是用一頭黑色公牛皮繩製的。同樣的魔法思想也表現在以黑公牛犢皮對付對手的效力方面，無論敵手是來自凡界還是陰間。至今在蒙古薩滿們對待其鼓的驅魔作用方面，仍然存在有這類思想⁽³⁾。火是神聖的，不能玷污之，它具有滌罪淨化的作用。人們相信在生命之後仍生活在死者的王國之中：對於那些已死亡的首領或貴族，一般都要以伴侶、僕人和所殺的動物陪葬，以便為他們在陰司作伴或確保為他們服務。

有關十二和十三世紀蒙古民間宗教的最為古老的資料都重視他們家神的形象。這些形象是用毛氈作成人形，置于幕帳進口的兩端。他們認為這些通過毛氈人像而人格化的神祇關心畜群並保護之。“他們用小塊絲綢或舊皮片製

(1)《元朝秘史》第 103 節，海涅什譯文第 25 頁。

(2)《元朝秘史》第 81 節，海涅什譯文第 17 頁。

(3)海西希：《庫倫旗的薩滿和哲詞》，載《民俗研究》第 3 卷，1944 年版第 39—71 頁。



作其它神像……為了製作這些偶像，附近幕帳中的年長女子們便集合起來，非常尊敬地把它們放在這裏……”以上便是柏朗嘉賓所介紹的情況^①。蒙古人用他們的綿羊、山羊、牛和馬初次所產的奶來為這些偶像奠酒。每次用餐開始時，同樣還要向這些偶像奠酒。我們這裏所指的是薩滿教中的翁衮模擬像。翁衮僅僅在十七世紀纔由喇嘛教中佛教神的複製像所取代。

儘管蒙古皇帝和統治階層都與景教、羅馬基督教、道教、儒教、漢地佛教和藏傳喇嘛教保持着接觸，但這並沒有排斥薩滿教的統治地位。一直到十四世紀（包括十四世紀在內），還存在一些有關宮廷薩滿教徒在中國蒙古君主宮廷中活動情況的資料^②。蒙古君主政權在中國崩潰之後，直到1368年，薩滿教仍是漢蒙走廊地區廣大蒙古民衆階層中占突出地位的一種宗教，後來的情況依然如故。當時的絕大部分蒙古大眾還沒有觸及到其它任何大型宗教，甚至在十三和十四世紀時還沒有接觸到喇嘛教。

有關十五世紀蒙古人中宗教生活的觀念和形式，祇有一些不太豐富的資料。相反，對於十六世紀來說，許多文獻都已經證實了薩滿所佔據的突出地位。這裏當然既是指漢人的報告（如明代一位高級官吏肖大亨針對北虜的風俗習慣就曾宣布過，偶像宗教是從蒙古的西部向北部傳播的）^③，也包

①見《元朝秘史》第216節，E.海涅什德譯文第105頁。

②《元史》卷17第9頁，卷3第6頁，《華裔學志》，1961年，第20卷，第31—32頁。

③塞瑞斯神父：《北虜風俗》，載《華裔學志》第10卷，1945年北京版，第117—208頁。